

TUI BIAN YU
XIN CHAO
• LEI DA

读史

与新潮

雷 达

蜕变与新潮

雷 达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6×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306千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420册

书号：10355·712 定价：平装本2.85元
平膜本3.25元

雷 达 印 象

——代序

唐 肇

雷达同志致力于文学评论，时间不算很长，但这已是他的第三本评论集了，而且可以说一本比一本有分量。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的勤奋。王阳明说：“学本于立志”，“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则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也。”雷达依靠自己顽强的学习钻研，取得令人赞叹的成果，验证了此说不虚。

我和雷达有点缘分，曾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

那是一九七八年，《文艺报》复刊不久，在文艺界老同志支持下，我终于重新回到阔别的文艺岗位。十年动乱中，中国作协与《文艺报》是所谓“砸烂”单位，一旦复刊，百废待兴。我虽回到编辑部，住处却大成问题，这时刚来编辑部不久的雷达，了解了我的窘境，便为我在东郊的农村中租了一间斗室，以解我的燃眉之急。他的爱人当时在公社工作，他也住在东郊麦子店，两处相距不远，下午下班时，便结伴骑自行车归来，沿途常常不免谈文说艺，有时谈得兴起，意不能尽，吃罢晚饭，他便来到我那间大小不过六平方米的斗室中，继续漫谈下去，

这种无拘无束的思想上的交流和切磋，不仅使我们探讨的问题得以深化，而且觉得在精神生活上是很大的满足，大大消除了乡居的孤寂。待我送他出来时，常常已是疏星三四点，微闻犬吠声的深夜了。

当时他给我一种印象，他对于自己所承担的评论编辑的任务是很认真的，而如何加强自己对创作现象和创作思潮的分析、鉴赏与判断的能力，则更为急切。据他告诉我，他以前写过散文、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字，评论文章写得并不多，到了《文艺报》这样的理论刊物编辑部，又正逢历史大转折时期，文学界正在拨乱反正的复苏过程中，他希望尽快地掌握这门学问，以迎接文学新时代的到来。他确实不放松自己，紧张的编辑工作之余，他不仅抓紧时间读理论著作和新出现的作品，也执笔写大大小小的评论文章。有时他把初稿拿来给我看，我自然力所能及地提点供他参考的意见，但每次他都十分认真地抓住不放，反复和我推敲。其实，有时我的意见不过是感想或印象，他那股认真得近乎执拗的劲头，有时把我也搞得颇狼狈。因为我毕竟没有象他那样反复地思索过、琢磨过。细想起来，他的渴望有所作为和好学深思的特点，正是他后来在评论领域不断深入堂奥，熔铸成自己的评论世界、评论风格的重要原因。

时代影响人也造就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文学走出了人为的、令人窒息的禁锢闸门，思想解放运动，恰如好风催雨，催发了文学大地的生机，短短几年，文坛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喷涌之势，无论是创作或理论都显现出异常活泼异常生动的景象。新的日月，新的思考，新的认识，冲击着僵滞的、陈腐的、保守的一切，正是面临这个勃发兴旺的文学新时

期，雷达“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思想变得更其活跃、更其敏锐起来。在大量纷至沓来的新作中，他常常能淘沙炼金，独具慧眼。把握住那具有时代特征、思想深沉、艺术独创的佳作。比如在最早的集子《小说艺术探胜》中，他评论何士光的《乡场上》，就从冯么爸精神状态的变化中，指出这种新的精神飞跃，既似偶然，实又必然，党中央富民的新政策，使得“庄稼人的腰杆挺起来了”，而冯么爸的心曲“是正在走向精神解放的人的声音，是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声音”。文章虽不长，却要言不烦，扼住了要旨，道出了作品的底蕴之所在。而对古华的重要作品《芙蓉镇》，更可以说，他是最早发现其意义与分量的一个。记得当时他曾几次催促我不可不读，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后来他在论文中以“写得真、写得奇、写得美”来概括全书的主要特点，认为作品“从‘小社会’的旋转变幻，来透视大社会、大时代的旋转变幻。他写的是小镇上的几家几户，隐现的是大时代的千家万户；他描绘的是小镇上的人生聚散，再现的是大世道的升降浮沉；他抒写的多是生离死别，儿女情长，隐括的是家国兴衰，政治风云。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途径上，作者显示出很强的功力和不凡的魄力。”我以为这是切中肯綮的见解，《芙蓉镇》超越于一般作品之上者，不仅在于以斑斓多姿的笔墨描绘出了湘南山镇中的世态人情，乡土风俗，而且在于小说中凝聚着对于历史、时代、社会的具有穿透力的深刻概括与思考。《芙蓉镇》终于获茅盾文学奖，证明他的判断分析与揄扬是坚实而经得住考验的。雷达这种对于文学现象的敏锐的感受力和审视力，可以说始终保持着。他读得多，想得多，比较得多，各种文学思潮的起伏脉络与发展轨道，都在他审视之列，因此他的文评很少给人以空泛

浮面的感觉，而是有深厚的认识与理解为基础的。他真诚地热爱文学，对当代文学的每一个新成果和新突破，更有着抑止不住的欣喜。在这个集子中，他对作家郑义的小说《远村》的评论，就是一个新的证明。这部作品是发表两年之后，被重新发现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那么，这部作品内蕴的艺术生命力，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雷达对它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作了很有见地的分析。《远村》写了太行山区贫瘠苦寒的土地上的畸形婚姻现象，但是正如雷达所指出的，“作者没有停留、满足甚至赏玩这种畸形婚姻的哀厉和怪异，而是从人情风俗史的变易的角度，从表现在苦难中锻冶着的我们民族性格和精神传统的需要出发，大大地扩展了题材和人物的内涵，有力地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自我生存的高度耐久力和坚韧的延展力。这就是作者处理题材上的清醒的历史意识。”我以为这个看法对于许多作者应该都是有启迪的，因为我们从有些作品中常常看到由于对生产和生活方式落后所造成的某类消极、畸形现象缺乏历史的与社会的纵深的认识与体察，只是停留于表面的展览或描绘，甚至是逐奇式的玩味上，因此不仅没有深刻地反映出民族性格内蕴深厚的力量，而且往往流于浅薄，雷达所指出的《远村》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雷达的文学评论，不仅力求从历史的、美学的角度探索和发掘一部作品能笼括的多方面的情感与理智的思绪与底蕴，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而且，他也常常能跳出作品本身，或从文学现象出发，对文学思潮、文学观念、文学趋势作出宏观的把握。比如在《创作自由与艺术空间》一文中，他对创作自由问题，就没有停留于为作家创造有利于自由创造的客观环境的角度加以阐释，而是更着眼于作家自身，即从如何在创作自由的

程度与艺术空间的发现之间的关系上提出问题，我以为这是从更深层次抓住了要点的，因为“从根本上讲，作家主体的创作自由的获得，只能依赖于社会实践的深度。即使外在环境提供多少许诺和保证，如果作家不能从主体的实践中生发自由感，就仍然不可能开拓出新的艺术空间。”换言之，就获取创作自由的最本质的意义而言，是不能依赖于外力的，而审美的主客关系则恰恰在于主体思维的深刻性和投入生活与洞察生活的深度，在于两者之妙合无垠，才可能有最大的心灵自由伸展于最广阔的艺术空间飞翔，极而言之，甚至在最严酷的客观环境下，也是不能阻挡这种获得的。我想，对作家而言，这样的提示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又如《对一个带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中，他则从当前日益壮阔的经济改革所激起的空前的深刻变动出发，指出一个时期的理论和创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是“对于‘经济关系’的某种漠视和遗忘，”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并指出世界文学史上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不寻常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它们对经济关系如何支配精神生活作出了深刻的描写，敏锐地揭示了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奥秘，因此，他提出要“加深对整个社会结构的主体化认识，特别是加强对经济关系在实际生活中的潜在支配作用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久前《新星》在读者与观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的现象，也立刻使他从这种广泛共鸣中看出时代对文学的选择，并且看出生活本身的积极的、活跃的、能动的作用，从而十分中肯地指出：“那种漠视读者的反应的态度是不可取的，那种认为杰出作品必然读者不会多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那种无视信息时代的特点，以为佳作只能越过当代读者由后人去评选的想法也是缺乏根据的。”他满怀热

情地呼吁“当代作家与当代读者真正展开热烈对话的时刻，必将是当代文学生命力高扬的时刻。”我希望他的这些理智而清醒的认识能促使作家们深长思之。

雷达写的虽然是评论文字，但绝少“八股气”，因为他十分懂得“止谤莫若自修”，人们对于评论的过分指责甚至嘲弄，只有以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以自己的精严博大和睿智的思想克服之，只有以扩大自己的主体意识舒展自己的评论个性，“永远保持清新锐利的感觉，永远热爱并拥抱人生和艺术，永远保持思想的弹性和反馈的迅速”消除之；雷达是孜孜以求的，他在谈论一篇作品时，曾提出这样的要求：“把历史、现实、理想交错，把哲理与诗情交融，巧妙地编撰一个生气贯注、激情丰盈的艺术整体”，我看也可移用于此。我虽不能说他的评论已完全达到了这样的境地，却可以说他正是有着这样的追求，因此他的论述总是和生气、激情、哲理交融交汇在一起，而一扫陈腐迂阔之气。你时时会感到，在严谨思辨的理论逻辑的外衣下，跃动着的是热烈的、诗情的灵魂。请看他在《远村》中的叶叶死后的抒发中，这样写道：“这里含藏的寓意，早已超出对愚昧乡俗的浅陋的、皮相的谴责，而是从民族精神生活的土壤上，升华起一股巨大的活力，如远山腾浪，如大海呼啸，如长城万里，以其生命和气势不绝地延伸着。”这不仅是评论，也同时是激情洋溢、文采飞扬、气势雄大的散文。这不过是随手撷来的小例子，我想这是构成雷达评论文字的魅力的重要因素。而他对作品艺术构成的整体把握，也常常使他透过生活的复杂系统的交叉与对比，得到卓拔不凡的，独到的哲理认识。比如我就十分欣赏他对《远村》中的猎狗黑虎在艺术构思中的对立统一意义的分析。黑虎勇猛、威严、机

灵，虽然非人，却是作者“人的完美理想的化身，是作者人格理想的象征”，是“一种理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作者对自由不羁的精神和高远理想的寄托，它的顽强拚死的搏斗与壮丽尊严的殒落，成为自然美的象征。我不知道作者是否在创作构思中有此构想，雷达的分析却确实将有助于人们对作品认识的深化。

雷达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说：“评论的对象是作家作品，是文学运动和潮流，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他的限制。他的本领就在于限制中的舞蹈，制约中的放歌，就在于发现内在的血液，预见运行的规律。”我觉得说得很确切。那么，他这位评论家，在这不无“冒险”的事业中，舞蹈得是否绰约多姿，歌吟得是否清丽入耳呢？读者自可从容检视文集中的文章，无需我的饶舌和褒扬，但就我的印象而言，可以用这样的话作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是为序。

1986. 4. 27.

BF78107

目 录

序.....	唐 挚 (1)
主体意识的强化.....	1
论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趋势.....	11
论小说家的转折.....	29
演变中的小说观念.....	45
对文化背景和哲学意识的渴望.....	60
当前小说中的农村“多余人”形象.....	75
创作自由与艺术空间.....	89
小说语言的弹性和魅力.....	94
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主题的推衍.....	108
研究新的生活形式	
——读1983年获奖短篇小说随想.....	121
对自由境界的向往	
——读1984年获奖短篇小说札记.....	128
在蜕变中奋进	
——1985年中篇小说印象记.....	138
时代怎样选择文学	
——从《新星》谈起.....	148
铸造自己的评论世界.....	155

《绿化树》主题随想曲·····	165
《远村》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	184
一块历史冶炼的顽石	
——论田家祥的悲剧性格·····	194
徐怀中风格论·····	207
模式与活力	
——贾平凹之谜·····	229
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	246
论金河的社会心理小说·····	258
铁凝和她的女朋友们·····	276
评航鹰的道德激情·····	288
邓刚的豪气、力度与薄弱点·····	310
沉有芷兮澧有兰	
——评何立伟的小说·····	322
写出中国农村新鲜的血和肉	
——序《古华中篇小说集》·····	333
陈祖芬报告文学的抒情性和哲理性·····	343
冲出历史峡谷的湍流	
——评矫健《河魂》·····	357
直通心灵的文学	
——谈刘亚洲《两代风流》·····	369
蒋子龙之新变	
——读《阴错阳差》所想到的·····	374
幽默感与《危楼记事》	
（附李国文来信）·····	380

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

（附张炜回信）388

灵魂的洗礼

——评《同船过渡》兼谈一个创作问题401

我们需要真实

——《五月》的感想407

水的外形，火的性格

——关于《井》的联想413

天道有常，精进不已

——读《名医梁有志传奇》418

游魂的复活

——评《红高粱》422

我的心哟，在高原

——评《麦客》429

后记 435

主体意识的强化

——对近年小说发展的思考

让我们先从《519长镜头》谈起。这篇小说发表后，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说，它的“题材”抓得好，刘心武毕竟是写“问题小说”的能手，今后再出了问题，特别是爆炸性的社会问题，就请他写。这里，作家显然被看作是一个能够适应和承担各式各样“问题”的载体——被动的载体了。我不禁想：这篇小说的成功，究竟是“问题”的胜利，还是作家的胜利？抑或是作家与“问题”的一次邂逅的喜剧？它的成功之谜究竟何在？

读者一定还记得，九年前的《班主任》里有个宋宝琦，现在的《519长镜头》里又出现了一个滑志明，这两个在年龄上恰好可以衔接起来的人物之间有无精神联系？“宋宝琦长大了”——这是我读小说时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滑志明坐在被画了胡子的雕塑姑娘下面无动于衷，也许因为他在十年前曾给《牛虻》一书插图中的女性画过胡子？滑志明的借录象带又懵然无知地“洗掉”，又是多么容易使人联想起宋宝琦的偷书却不识书呵！我想，我的这种自由联想大约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说明作家多少年来对那些空虚的、无知的灵魂（在《519长镜头》中又叫作“浅思维”），始终抱着人道主义的关注。换句

话说，它反映了作家主体心理结构的某种稳定性。然而，在这近十年间，刘心武早已走出教室和学校，进入了立体交叉的当代都市，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他写过许多新的题材和人物，他的思考也更加富有当代意识了。如果说，当年他把“小流氓”宋宝琦的失足主要归因于“四人帮”的残害，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把滑志明放到一个更为宽广复杂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背景上了，滑志明也因之得以自由自在地按他的性格逻辑存在于作品中。假若我们也来个“定量分析”，作品无非由三方面因素构成：一是球场事件的紧张刺激场面及有关材料；二是滑志明的行动始末；三是作家刘心武的无处不在的主体的渗入。我以为，《519长镜头》震撼并促使读者沉思的，恰恰是渗透着作家主体意识的挖掘——十年浩劫遗患；当代青年的社会心态；某些人在物质诱惑和商业文化熏染下的精神迷失；一直挖到民族心理素质的优劣；而浸透在人物事件中的作家的当代意识，便是整部作品的“混凝土”。从这里又反映出作家主体心理结构的变易性。似乎可以这样说：对迷惘的灵魂与底层社会心理的不倦的追踪和综合审视，使刘心武比别人更能抓住这一“问题”的实质；而刘心武的具有宏观眼光和当代意识的分析力，又使他能给“问题”注入新鲜的、深刻的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容易作出简单因果判断的“519事件”，在刘心武手里生发出不寻常意义的真正原因；这也就是司法的眼光不再能够代替文学的眼光，《519长镜头》获得自由品格的真正原因。

所以，这个例子可以给我们多重启发。它告诉我们，作家的主体意识才是作品价值的立法者，作家主体意识的深浅强弱广狭决定着作品价值的大小。而在今天，作家的是否具有当代

意识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就尤为重要。这一认识事实上早已
被过去卓越的理论家揭示出来，只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我们的
真正重视罢了。例如，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
镜子》就是一篇论述主体意识的杰作。在这里，我想对流行看
法大胆提出一点怀疑。要问：列宁关于“一面镜子”的本意是什
么？现在的解释性著作大都说是指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认为解
释错了。列宁的“一面镜子”恰恰指的是托尔斯泰本人及其思
想矛盾，这才是本意。列宁明明说：“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
盾，是一面……镜子”。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其它文章里，列宁
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这正是需要我们深刻领会的。再例如，
普列汉诺夫在分析拉斐尔的圣母像——这个由基督教文化授予
西方艺术家的一个“永恒”题材时说：“通过这些圣母像的宗
教的外形，可以看到一种纯粹属于世俗生活的十分巨大的力量
和十分健全的欢乐，这已经与拜占廷大师们的虔敬的圣母像没
有任何共同之处了”，为此他进一步发挥说：“一个艺术家如
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
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地降低。”（《艺术与社会生活》）
的确，一个作家对题材本身浮面的意义的依赖性越大，他就越
是没有主动性。能动的主体可以征服题材，超越题材，既可从
同一样东西看出不同的意义，又可用不同的眼光看同一样东
西，一旦主体的目的性与客体的规律性取得融洽，某种相对
的自由境界就出现了。《519长镜头》的例子还告诉我们，作家固
然需要寻找题材，甚至“问题”，但他同时必须寻找自我，发
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这是两种同时并行的“寻找”。
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在哪里？也许，在于刘再复同志所说的属于
每个作家自己的“灵感圈”吧；或者还应该加上属于每个作家

自己的“蓄水池”。艺术的天空是广阔的，但它对每一种存在物的选择又是严苛的；只有找到自己的飞行姿势和领空的鸟儿才会感受到这种广阔性。

在近一、二年间，小说领域发生了比以往更加急剧的变化，这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现在，人们正在谈论着诗化、抽象化、散文化、象征化、哲理化和荒诞、变形、幽默、非逻辑联想、超感觉之类的新奇话题，正在探讨着改革、寻根、心理积淀和大自然之类严肃的问题，象激溅起五颜六色的水花，象放射出纵横交错的光柱，“真正的多样化来临了！”人们发出这样的赞叹。我想，这一切无疑都是小说领域变化的特点，但这一切变化的枢纽和核心，乃在于小说家主体意识的变化，它开始向真正的主体地位上升。正是这个根本之点推动了当代小说多变而又多彩的局面。看到这一点，才不至迷幻于形式的斑斓多姿，才能够发现奇特新异的艺术手法后面的严肃的思索。

是的，今天的小说家们很象蝉的褪壳一样，有的已褪尽一层旧皮，有的正在蜕变之中。小说家们经历过大家一起写伤痕，一起深切反思，一起思索改革……的令人不无留恋的时期。然而，那时大家尚未完全“分家”，大体从一个“门”出入，主体意识处于相类似的被动状态。那时，很多小说家急于向客体寻索最尖锐、最大胆、最新鲜的题材，以之作为政治和社会斗争的有力证明。而主体意识相对地封闭着，缓慢地变化着。不过，复杂的变动的生活本身很快反诘作家：你自己变了没有？于是，近年来小说家的寻求、探索、创新，就染上了浓重的对于主体意识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更新的特色。

我们看到，作家把他们在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蜕变过程中感悟到的新的观念、新的认识、新的激情，溶化和渗透到了对作

品中人物的评价之中。作家主体的人的发现被投射到作品中人的发现，于是，主体给小说创作面貌带来的变化，首先还是体现在对当代人的灵魂和境遇所作出的富于当代意识的新的理解。一幅幅在当代意识观照下的社会心态图画，从内里发散着现代魅力。因为，蜕变中的当代人渴望在作品中找到自己的面影。《519长镜头》的写法是传统的，但其中有蘸着当代意识的机智分析，这就不但能抓住球迷，而且能抓住广大同代人的心灵。口述实录体的《北京人》，有一种跃动着时代脉息的、跳出纸面的“临场感”，它与读者的距离几近消失，读者一翻开它就踏进生活去了。这里特别要谈到王蒙今年发表的《高原的风》和《冬天的话题》。王蒙很早就说过“我在寻找什么”的话。他的主体是活跃的、多变的，苏醒得早。然而，他在这两篇小说里仍然放进了新的理解。这两篇小说格调和手法全然不同：一个写实，一个借助荒诞外壳；一个写个体，一个写群体；一个写当代人的心理常态，一个写当代人的心理变态；一个不无庄重的悲剧意味，一个则在漫画式夸张引发的辛辣大笑中向病态的社会心理发起攻击。但是，不管是宋朝义灵魂蜕变的痛楚，还是对“沐浴学”引起的极端无聊、庸俗、狭隘的永无休止的“争论”，王蒙都作出了具有当代性的洞观——他决不固守在陈旧观念里惋叹或疾言厉色。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两篇小说一面是深沉的爱，一面是深刻的憎，它们来自同一“蓄水池”，全从王蒙一支笔下溢出，是同一心脏分配给两条血管里的血。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觉这样的看法未必确切：王蒙是很少憎，尤其是很少使用“恨”的。他对“沐浴学”的无止无休的聚讼，几乎是抱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洞观态度，只能是以大笑对之。这也是他那丰富的宽阔的主体意识决